

关注

艺谭

中国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推进

廖奔

跨文化戏剧演出是不同文化戏剧间的横跨、移栽、选择与价值判定,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项20世纪后期才真正开始的工作,具体说就是“新时期以来”。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拿来”西方戏剧,虽说也有一定跨文化戏剧的影子,但那时的膜拜心态支配下,更多是“取代”而非“比较”,所以出现了厚薄彼此的一边倒倾向,这使得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不得不前往西天取经盗火以求证自身的价值,以求得平等、对等的地位。没有这个地位,何来跨文化比较的客观性?

新时期伊始,我们才有条件开展真正的跨文化戏剧演出和研究,但西方却早了我们一两个多世纪。如果说传教士马若瑟1735年翻译元杂剧《赵氏孤儿》引动了欧洲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引起伏尔泰等西方戏剧家改编上演的《中国孤儿》是西方对中国的跨文化戏剧行动的话——这个行动给当时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和欧洲剧坛上的中国戏剧热又添了一把火,那么,19世纪欧洲专业汉学形成后,戴维斯、儒莲、巴赞等人的戏曲研究也就是跨文化戏剧研究的先驱成果了。戴维斯1817年发表的《中国戏剧简论》,巴赞1838年发表的《中国戏剧选导言》都是创始之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引发西方戏剧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于是西方出现了人类整体戏剧的概念和论著,产生了1866年德国克萊因的13卷本《戏剧史》,其第3卷“欧洲之外的戏剧和公元元年至10世纪拉丁戏剧”论述了中、印、日和印加戏剧;1887年意大利布罗兹《东方民族的戏剧和表演》从古代犹太人、波斯人表演一直讲到印、中、日戏剧;1897年丹麦曼奇乌斯6卷本《古今戏剧艺术史》第1卷“原始演剧艺术”论述了中、日、印三种古老戏剧样式;1887年另一德国学者哥特沙尔的《中国戏曲及其演剧》则是第一本中国戏剧专著。

当然,上述西方学者对中国戏曲的跨文化实践与研究还只是偶然现象,真正的西方跨文化戏剧的兴起是在20世纪之后,为突破写实主义和假定性日趋严重的限制与羁绊,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舞台反叛把目光投向了东方舞台,打破东西舞台壁垒、打破写实与写意壁垒、打破复制与虚拟壁垒的尝试愈演愈烈。西方的跨文化戏剧舞台实践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迄今仍然是现代派戏剧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股潮流当然也影响到中国,影响到中国新时期戏剧的面貌与方向。中国话剧舞台上,事实上20世纪一整个世纪都在进行向传统戏曲手法与表演美学的吸收与借鉴,这使得中国话剧长期染有跨文化的色彩,只是这色彩不像20世纪西方舞台上的跨文化戏剧色彩那么浓郁、集中和更加带有异质文化融合的味道,也没有跨文化戏剧的理论自觉,这种自觉是新时期以后才真正觉醒的。

但中国戏剧舞台上演得更加生动的则是戏曲移植西方戏剧题材的演出,这种演出也始于20世纪初叶,当然那时只是对内容的兴趣起主导作用,也缺乏跨文化的理性自觉。这种自觉在新时期与话剧一起觉醒,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对这种跨文化戏剧现象的关注和研究,虽然伴随着舞台的始终,但却零散、偶然、片段,一直未能形成体系性的成果,这种状态被陈戎女在《古希腊悲剧在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一书中的探究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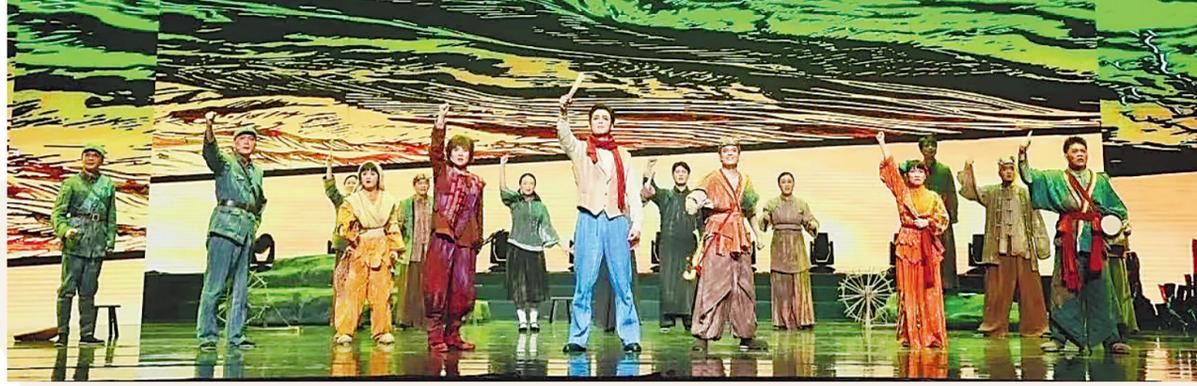
陈戎女是古希腊悲剧研究家,我们从她对古希腊悲剧的整体与深入把握出发来关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古希腊戏剧演出现象,能够领悟到更多、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作出更加具体翔实的价值评判,其思维成果就能够超越一般性、片段式、偶感式研究和评论的泛泛而论,更加触及实质。我由此兴趣大开,心里期盼着有莎士比亚、易卜生研究家,期盼西方现代派戏剧家也能够从各自的专攻角度来关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跨文化戏剧演出,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就会有更多类似的成果涌现出来,这些并非泛泛而论的著述加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中国当代跨文化戏剧研究的一支重要成果。愿我的这一期待能够得到后续响应的之声。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表现创作者对生活缤纷多姿的发现与感受

——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儿童剧小戏《遇见星海》剧照



木偶剧《海关》剧照



湘剧小戏《一盏渔灯》剧照

“戏剧的百花园不止要有‘参天大树’,还要有‘灌木’,‘戏剧生态不能只浮在‘高大上’的层面,深入‘民间’基础才能牢固”,“小戏小品是戏剧创作的试验田,要努力发现更多有才华的青年创作者”。日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西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在西安圆满闭幕。回顾此次展演,来自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2个剧种的75部佳作,组成10场主题展演,并由专家组推选产生了10部组委会“特别推荐剧目”。近年来,随着戏曲、戏剧生态的变化,在不少地方剧种、小戏和基层青年工作者已走向“边缘”的情况下,焕发小戏小品的艺术价值有何意义?如何更好地推动其创作?在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与艺术家代表结合此次展演的剧目,围绕小戏小品创作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的戏曲、戏剧只有全方位地发展才能促进中国戏剧艺术全方位的繁荣。”中国剧协原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对小戏小品的创作一直十分关注。在他看来,戏剧的发展不仅要有大戏、大剧目做支撑,更要有众多深入民间、深入生活的小剧目提供土壤,创作者有多大舞台就写多大情感,有多大情感就发挥多大作用,从而共同促进戏剧艺术的全方位繁荣与高质量发展。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戏剧创作者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不少剧团对创作者‘收拢性地使用’,对‘大牌’趋之若鹜,却缺少对理想的青年戏剧创作者的培养,使人才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很大的隐忧”。从这个角度上讲,重视小剧场以及小戏小品的舞台创作,包括编剧、导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等在基层戏剧工作者提供的创作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文艺界的“轻骑兵”,小戏小品与传统“大戏”相比,有着篇幅小、人物少、道具少、易排演等优点。2005年,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在全国性戏剧艺术综合奖中国戏剧奖下设立了常设奖项“小戏小品奖”,每两年评选一次。2015年,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奖项取消后更名为“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从“小戏小品奖”到“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戏剧发展的生态问题得到了更多重视。戏剧评论家丁科明观察到,近年来,随着更多专业力量的加入,许多小戏小品已从过去“晚会式”的创作转向了“精品创作”,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把‘业余创作’纳入专业艺术创作,对各地小戏小品的创作影响很大。”丁科明说。近年来,包括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等在内的各种全国性、地方性的文艺评奖、推优平台成为激励小戏小品精品创作的重要推动力。以此类展演为例,不仅规模比往届更大、传播手段更新、专业化程度普遍更高,还有“很多新手段和新的创作方法出现在小戏小品的舞台,使今天的故事变得更有吸引力,引起了更多青年观众的关注。”导演姜乃鸣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戏剧评论家宋宝珍看来,这些作品有的展现了新时代出现的新景象,戏小而格局大;有的运用了最新的多媒体技术或新的美学表达;在创作主体方面既有专业剧团,也有基层剧团和文艺新人,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小戏小品创作的新景观。

如本届“特别推荐剧目”中,“戏曲小戏”单元的湘剧《一盏渔灯》以现代心理小戏的形式揭示部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音乐剧《说亲》以幽默风趣、乡土韵味醇厚的艺术风格表现相亲故事;眉户小戏《村官山花》讲述农学博士担任扶贫干部,带领乡亲发展乡村产业的故事。“话剧小品”单元,小品《爷爷的奖杯》歌颂退休老教师的默默付出;儿童剧《遇见星海》讲述5名孤儿在延安偶遇星海,在音乐的熏陶和战火洗礼下成长的故事。此外,“基层院团与群众文艺”“校园戏剧”“新文艺群体”单元的两头弦小戏《公鸡过寿》,曾获群星奖的小品《烟》《打折》,还有木偶剧《海关》、话剧小戏《谁是邱娥国》等均以新鲜的选题、创新的视角从生活小事、普通人身上挖掘人性的真善美,透视生活本质,展现了基层创作者对生活缤纷多姿的发现与真诚真实的感受,呈现了当下

小戏小品创作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坚定的创作立场和多元的美学风貌。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信心。”崔伟表示,小戏小品在发现与表达生活上更少羁绊和束缚,更有利于创作者“表达力”的绽放。与此同时,对于参演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一些创作题材过于集中、作品艺术风格有同质化倾向等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穆海亮谈到,小戏小品的创作还应进一步打开创作思路、丰富创意视角。创作者要注意避免把悲情等同于一味煽情或苦情,要增加“戏”的元素,避免作品流于唱段的堆砌或歌舞的连缀。同时,在轻喜剧、红色题材、英雄题材之外,也期待能看到更多以促进社会和谐、人性完善为创作旨归的讽刺喜剧。此外,一些小戏作品体量过大,或在“大戏改小”过程中造成的主题表现仓促、作品有“裂痕感”等现象也引起了热议。专家认为,未来小戏小品的创作还要更注重对剧种的表达和流派的使用,要突出自身个性和特色,与“大戏”在主题、选材、审美风格、表现方式、叙事视角等方面有所区别。小戏小品在以小人物、小题材、小作品反映大观念、彰显探索性的同时,应更多展现扎根人民的“群众性”艺术色彩,通过对生活实实在在的思考与真诚表达,真正地打动当代观众。

“小戏小品要‘走好题材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创作者有深刻于常人的对时代的认识和把握。”崔伟谈到,对于基层创作者而言,在对生活的提炼和以生动凝练的语言进行表达这两门功课上还需进行更多锤炼,“要努力把生活酿成酒”。针对当下一些小戏小品的创作过于注重艺术手段的“创新”而忽略戏剧文本,造成作品情节

草、情感粗糙等问题,《剧本》月刊副主编武丹丹认为,小戏小品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注重戏剧文本的高质量,“无论是‘大戏’的宏大叙事还是小戏小品的精耕细作,戏剧文本都要挺在最前线”。提及中国剧协在张家港、深圳、东莞等地建设的小戏小品基地取得的经验、成果,武丹丹建议相关部门还可以进一步延伸服务手臂,提前发现、帮助更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及作品,对有潜力的作品可以提前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帮扶,此外还可以设立青年剧作重点扶持名录,对缺少“落地转化”条件的佳作协调人力物力资源帮助作品先“立起来”。“发展戏剧的力量可以从对一颗种子的帮扶开始,通过平台的发现、孵化和精益求精的打磨而推出一批优秀的原创作品。”

宋宝珍认为,“优秀的小戏小品是反映时代的讯号,是‘快手’‘短枪’。无论是表现生活的一瞬间、行动的一刹那还是人性的闪光点,都可以成为‘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创作好小戏小品,编创更要有善于发现新时代新趋向的格局与眼光。创作可以不必细而密、大而全,也不必有太多过渡铺垫,但无论何种风格类型,都应当精心布局、精雕细琢,从而实现精致、精妙的艺术效果。“美是和諧与引力。”宋宝珍希望未来小戏小品的创作能从主题、结构到逻辑、形式都更多地体现“美”,做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以更多有筋骨、有气魄、有特色、立得住的人物形象塑造,反映更多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动,让观众由衷感受到美的真谛与传递。

探索中国音乐剧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本报讯 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剧研讨会暨音乐剧学院奖于10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中国音乐剧孵化基地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中国教育电视台党委委员兼副台长陈宏、昌平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冯志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编创委员会会长王海平等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研讨会聚焦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发展,结合具体作品讨论如何将中国的文化元素与西方音乐剧传统相结合,创造独具特色的音乐剧表达方式。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音乐剧发展离不开完整的故事内核,但创作者的创新和巧思是承载作品内涵、让其立足的重中之重。创新和巧思,对于导演来讲是如何驾驭作品中新颖的视觉、情感和叙事元素,提高演员的表现力;对于编剧意味着如何设置剧本中的人物,让其在困境中展现个性与人性;而对于作曲是让唱段旋律更加契合人物内心的情感宣泄;对于演员,创意则体现在突出舞台动作和肢体语言对角色进行诠释、互动与对话。本次研讨会还专门设有“青年论坛”,为青年音乐剧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第八届“音乐剧学院奖”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本届“音乐剧学院奖”个人与团队报名渠道共收到作品360余部,涵盖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匈牙利、波兰等10个国家,15组海外参赛作品,共计106所国内外高等院校和专业院团报名。最终,评优评选出16组个人与10组团队作品进入终评。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周映辰介绍,8年来,“音乐剧学院奖”形成了学习、研讨、交流和实践推优的模式,通过研讨会、专家公益课堂和“音乐剧学院奖”的舞台展示共同完成一场艺术盛会,以音乐戏剧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达年轻人的家国情怀。“音乐剧学院奖”举办至今,已有逾百所高校、千余部作品参加,为音乐剧人才的成长做出贡献,逐渐塑造出强调实验性、先锋性、思想性的艺术品格。(任晶晶)

话剧《小西湖》温情讲述城市“改造”故事

转角咖啡馆、精品民宿、虫文书局、秦淮灯彩博物馆……这是位于南京老城城南的“小西湖”如今的面貌。作为南京28处历史风貌区之一,曾经居住条件差、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的“小西湖”的改造,以保护历史文化、增强人民幸福感为目的,写就了一个“既看得见发展、又留得住乡愁”的温情的城市建设故事。11月1日,根据这一题材创作而成的南京市话剧团原创话剧《小西湖》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在该剧媒体见面会上,编剧唐栋、导演傅勇凡、南京市话剧团副团长、主演杨彦与演员于东江、夏莹等分享了创作心得。“《小西湖》讲述的是人间百态、生活万象,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唐栋谈到,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旨下,城市中的每个居民,每位建设者都在用中国人的智慧来面对发展中的新情况,面对保护城市根脉、传承历史文化的新方式。如何写好今天的城市改造故事,他从老舍的《龙须沟》中获得了启发,力图用小说家的笔法,通过“小西湖”里众多细碎的小故事、小结构、小细节勾画人物的面貌和性格,将小人物、真情感融入城市的更新发展进程中。傅勇凡表示,“小西湖”聚集了青年人在面对发展、面对历史时的智慧和力量,希望观众能通过该剧看到当代青年人的冲劲和朝气。“《小西湖》给予我们的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机会,更是通过它与城市的历史文化与发展建立起一种连接,用艺术的方式呈现每个城市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杨彦说。10月30日,在2023紫金文化艺术节颁奖仪式上,该剧获“优秀剧目奖”,杨彦获“优秀表演奖”。晋京演出之后,该剧将开启全国巡演。(路斐斐)

【京剧的守正与创新——余三胜】余三胜是京剧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其子余紫云是著名京剧旦角艺术家,其孙余叔岩为京剧余派老生创始人。余氏一门,祖孙三代为京剧艺术的形成、成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罗田县是余三胜的故乡,在罗田举办研讨会也是京剧的“寻根”之旅。这次活动的举办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对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尚长荣谈到,京剧的守正与创新,要做到激活与融入。传统并非不创新,古典也并非不时尚,京剧创作不仅要尊重传统、研究传统,还要在继承前人宝贵技艺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和观众需求,做到“激活传统,融入时代”,创造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舞台艺术作品。王勇表示,此次研讨会既回顾了京剧的优良传统,讨论京剧艺术本体的价值与意义,也展望了新时代京剧发展的美好愿景,通过不同视角、层次、维度的论题,探讨京剧在新时代的传承发扬和推陈出新,探索京剧文化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更加明晰了戏曲研究者、从业者肩负的使命和任务。研讨会设置了4个分论坛,围绕“余三胜及余氏一门文献史料挖掘与研究”“京剧的守正创新与院团管理研究”“京剧的时代性与余派的传承发展研究”“罗田京剧小镇的打造和地域文化发展研究”等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京剧的传承与发展。与会专家表示,京剧艺术的“守正”不仅需要一字一腔、一招一式的继承,还需掌握历代艺术家所秉持和遵循的道理、规律和方法,这样才能在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上更趋向于“守正”的本质。而“创新”要在充分掌握前辈艺人所创造的技艺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嗓音、形体的条件以及时代需要,进行扬长避短地艺术改造和变化,通过自身创造给艺术流派注入不竭的生命力。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京剧》杂志社理事会议成立大会,国家京剧院创作基地、《中国京剧》杂志社研究基地、国家京剧院京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湖北黄冈考级点、罗田县余三胜京剧团示范点挂牌,国家京剧院还带来了京剧《五女拜寿》、“京剧余派老生折子戏专场”、“京剧名家段演唱会”等演出,并考察调研罗田京剧小镇的建造情况。(杨茹涵)